

小农的嬗变:《兴国调查》八个农民家庭的追踪研究

□ 鲁可荣, 金 菁

[摘要] 以1930年毛泽东《兴国调查》中八个农民家庭调查及后续跟踪调查为基础,比较分析了八个农民家庭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变迁及发展。研究发现,八十多年来八个农民家庭已经从自给自足的传统小农转变为市场化、社会化的现代小农。同时,农民自身发展及传统农业型村落转型仍然面临诸多问题。因此,推动农民全面发展及传统农业型村落成功转型是促进新型“四化”同步发展以及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关键。

[关键词] 兴国调查;家庭变迁;农民发展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179(2014)01-0068-07

Peasants' Transition

— a Retrospect Research of the Eight Peasant Families in *The Investigation in Xingguo*
LU Ke-rong, JIN Jing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Mao Zedong's investigation into the eight peasant families in *the Investigation in Xingguo* in 1930 and a series of retrospect investigations conducted since 1980, a comparative analysis is done on the changes and developments of the eight peasant families' production mode and living style. It is found that the eight peasant families have changed from traditional self-sufficient peasants into modern socialized and market-oriented peasants over the past 80 years, while peasants' self-growth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villages are still confronted with great challenges. Therefore, it is critical to encourage peasants' overall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villages for the sake of promoting the synchronous development of "four modernizations" and th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Key Words: *the Investigation in Xingguo*; family changes; peasants' development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小农经济与小农理论的研究一直为学术界所关注。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小农”的经典论述,“小农”既指小农化的生产方式,又指小农化的生活方式。传统小农具有以下基本特征:小农是小块土地的所有者和经营者;小农的生产是自给自足的,缺少社会分工,排斥商品经济,使用落后的生产工具和传统技术;小农是分散、孤立、封闭的,没有丰富的社会关系。小农的历史演

变经历了从“古典式小农”到“宗法式小农”再到“现代的小农”的嬗变。近百年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生的巨大变迁与发展在农村社会基本单元——村落和家庭层面烙下了深深的痕迹。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农村经济社会面临着巨大转型和发展。随着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以家庭为单位的传统生产方式正逐步向农业兼业化、非农经济化、市场化以及社会化的生产方式转变。因此,有学者指出,目前中国农民生产、生活、交往都被卷入“社会化”大分工网络,属于“社

会化小农”。^{[1](P5-13)}那么,在急剧的生产方式转型和制度变革中,传统小农的生产方式是如何向“社会化小农”转变的?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农民发展及其所在村落变迁转型的轨迹如何以及面临哪些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研究探讨有助于继续推动农村改革及农村可持续发展。

二、毛泽东对八个农民家庭的调查及后续研究

1930年上半年随着中央苏区根据地迅速扩大,中共党内开始出现“左”倾机会主义,抛弃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工作,脱离实际指导土地斗争。1930年10月初,红一方面军打开吉安后,行进到新余县一带。为了说服和教育党内同志以及纠正土地斗争中的错误,正确地指导土地革命,毛泽东同志乘机找到了兴国县永丰区红军预备队的傅济庭、李昌英、温奉章、陈侦山、钟得五、黄大春、陈北平、雷汉香八位同志,在新余县的罗坊开了一个星期的调查会,即著名的“兴国调查”。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对八个家庭的观察、本区旧有土地关系、斗争中的各阶级、现在土地分配状况、土地税、苏维埃和农村军事化等。^{[2](P182-251)}

对八个农民家庭调查涉及每个家庭的人口、劳力、生活、家庭成员的文化程度、职业身份等方面。在此次调查基础上形成的《兴国调查》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中央苏区农民家庭生计、农村各阶级状况,确立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党的工作方法和作风。

自1980年以来,相关机构和学者一直非常重视对《兴国调查》中八个农民家庭开展回访性调查。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调查有:1984年,赣州地委党史办、中央苏区协作办、江西省苏区协作办对八个农民家庭进行的回访。1988年,江西省社联和兴国县社联等对八个农民家庭经济状况进行了全面调查。中央政策研究室与江西省社联于1995年至1996年先后对八个农民家庭做了三次调查。此外,兴国县相关机构及学者^①也不定期地对八个农家进行走访和调查。上述调查形成的主要研究成果有:柯受森、肖桂全的《毛泽东〈兴国调查〉中八个家庭再观察》,^{[3](P593-614)}傅伯言、罗莹的《他们走出了绝对贫困的沼泽——对毛泽东〈兴国调查〉中有关人员后裔情况的再调查》,^{[4](P1-7)}胡玉春的《〈兴国调查〉中八个农民的命运》,^{[5](P52)}赖福荣的《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兴国调查”——从八个农民家庭今昔看中国农村变化》^{[6](P50-55)}等。这些研究成果呈现了八个农民家庭在不同时代的经济变化和发展,但缺少从整体的视角对农民家庭变迁与发展的比较分析,未能从宏观层面将农民家庭变迁发展与社会制度、国家政策等

方面有机结合加以系统研究。

为了全面系统地对毛泽东《兴国调查》中八个农民家庭变迁与发展进行比较研究,课题组在上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2013年6月采用参与式调查方法对八个农民家庭进行了深入调查,试图通过对1930年毛泽东《兴国调查》中八个农民家庭调查及后续跟踪调查研究的历史回溯,分析传统小农向“社会化小农”转变的历程,探讨村落变迁与农民发展的巨大成就、变迁轨迹及发展规律,为继续推动农村改革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

三、八个农民家庭结构的变迁

1930年毛泽东对八个家庭的生计调查主要涉及家庭人口构成、文化程度、家庭成分、从事职业等方面。1980年以后对这八个农民家庭的后续调查也沿袭了毛泽东当年调查的内容,从而形成了八个农民家庭较完整系统的家庭谱系演变。根据1930年、1988年、1995年、2001年、2008年和2013年八个农民家庭的调查资料,可以看出,八个农民家庭谱系演变和家庭结构变迁呈现如下特征。

1. 家庭代际传承绵延,人口繁衍呈橄榄型结构变化

八十多年来,八个农民家庭传承了4~5代。然而,除傅济庭、李昌英、温奉章有亲子嗣以外,其他五人都是通过从宗族同辈中过继儿子来延续家庭香火传承的。傅济庭、李昌英、温奉章在参加红军前就已经结婚生子,陈侦山、钟得五、黄大春、陈北平虽已结婚生子,但子女多夭折。雷汉香在参加红军前尚未结婚。陈侦山、雷汉香在战斗中牺牲;陈北平在肃反高潮中被杀害;黄大春和钟得五参加红军后无音信。

八十多年来,八个家庭人口增长迅速,尤其是第二代和第三代的家庭子女数明显多于第一代和第四代。第一代农民家庭人口多在5~7人左右,这与当时农村经济困难,小农家庭难以养活过多的人口有关。第三代出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口高峰期,家庭子女人口数较多。随着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及农民生育观念改变,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第四代基本上是一对夫妻生育1~2个子女。

2. 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逐步提高,但多为初中文化程度

20世纪20年代“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而在这里面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

^① 如:兴国县人大赖福荣(1995、1996、2008)、县政协胡玉春(1988、2001、2008)、华中师范大学黄振华(2008)等分别在不同年代对八个农民家庭进行了实地调查。

的群体中，最大多数是农民。”^{[7](P39)}然而，1930年毛泽东所调查的八个农民大多接受了文化教育，除李昌英和雷汉香的文化程度不清楚外，其余6人都读了4~8年书。1988年除傅济庭的长子傅学扬是文盲外，其余七个农民家庭的第二代男性都是小学毕业，其中，温常鑫、钟来发、陈显来是初中毕业，温常鑫1985年还成为村小学公办教师。1980年以后出生的第四代普遍为初中文化程度，但是考上大学的不多，只有李吉锴的五儿子李士森和温国禄的儿子温成剑大学毕业。

3. 家庭结构由联合家庭到核心家庭向多元化家庭结构转变

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单元，家庭的代际结构与家户关系变化可以明确反映出家庭结构的变化。家庭经济条件的改变、主要劳动力的职业变化以及代际流动是影响家庭结构变化的主要因素。

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经济以自给自足为主，家庭既是最小的生活共同体，又是基本的生产单位。家庭男性劳动力除了要耕种自家的少量耕地，还要租种地主土地，农闲时再兼营一些副业以贴补家用。成年女性(妻子)主要承担照顾孩子、养猪、洗衣做饭、砍柴等家务活。因此，大部分农民家庭都为联合家庭结构。如陈北平夫妻上有父母或有同辈的兄弟，下有子女，即使兄弟已经结婚及生子，也未分家立户，家庭成员之间各尽所能、分工明确，共同维持家庭生计。

1949年后，尤其是农村实行高级社和人民公社体制后，农民家庭的生产功能消失殆尽，家庭生活功能也仅局限于生育、情感等方面，教育、养老等方面都由集体来承担。这一时期，农民家庭成年长子在结婚后大多是分家立户，而小儿子结婚后一般与年长的父母共同居住，因此，在许多农村核心家庭与联合家庭共同存在。

20世纪80年代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家庭生产功能重新恢复。为了充分发挥家庭成员的劳动积极性，家庭分家立户更加明显。成年男性结婚后一般都与父母兄弟分家，自立门户，形成核心家庭。当成年子女都已婚嫁后，老一辈父母就独自生活，形成空巢家庭。1990年后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从初期的第三代夫妻一方“候鸟式”外出务工到2000年后的第四代夫妻双方长期外出务工，家庭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外出务工的子辈虽然与父辈分家立户了，但承包地由父辈代种，未成年孙辈跟随祖辈生活，子辈给予父辈一定数额的经济补助，只有在过年时，全家才能团聚。尤其是第四代，由于夫妻双方长期在外打工，只在结婚、过年或生孩子时才短暂回家，大多数

不再与父辈或兄弟分家单独立户，只是小夫妻经济独立，按照父辈生活和照顾子女开支等自愿负担费用，出现了类似传统的“四世同堂”甚至是“五世同堂”的大家庭，从而呈现核心家庭弱化、空巢家庭虚化、联合家庭形式上再现的“户分家合”“分业不分家”的多元化家庭结构的发展趋势。这样的家庭结构既保证了年轻夫妻外出打工的稳定性，又有利于幼年子女照料以及老年人精神慰藉。如陈北平的继子陈显来家庭自1995年以来，虽然儿子结婚后分家，但由于儿子和儿媳长期在外务工，两个孙子都由陈显来夫妇照顾，承包地也由陈显来耕种，儿子不定期给父母亲生活补贴，形成“户分家合”的局面。2008年后，陈显来儿子和儿媳开始从广州回到县城打工，以便照顾年迈的父母。而两个孙子也陆续结婚并生子，两对年轻夫妻长期在广东、福建打工，他们并没有像父辈那样在结婚后自立门户，都居住在一栋楼房里面，但各自经济独立，从而形成“分业不分家”的家庭结构。

四、八个农民家庭生产方式的变迁

1. 土地结构从缺少耕地向家庭承包土地转变

1930年兴国县“八月分田”前，农民只有很少的自有土地，“照兴国第十区即永丰圩一带的土地情形来说，旧有田地的分配如下：地主40%、公堂10%（为地主富农所共有）、富农30%、中农15%、贫农5%……真正的剥削阶级（地主富农），人数不过6%，他们的土地却占80%”。^{[2](P199~200)}20世纪30年代，八个农民家庭人均耕地只有0.5亩左右。^①由于人多地少，无法解决温饱，只能向地主或公堂租种土地，缴纳高额的地租，大多数家庭都要借高利贷。如温奉章家“从地主租来120石谷田，不押钱，要量租。120石均水灾田，实只能收90石水谷（每年收一次），八折成为72石燥谷，要量去55石租（租率75%）余剩17石，吃食不够”。^{[2](P188)}

1952年春，兴国县开始实行土地改革，农民拥有了土地。但是随着人口不断增加，农民人均耕地面积大幅度下降，1957年人均耕地为1.9亩，1965年下降到1.47亩，1978年减少到0.99亩。^{[3](P128)}由于人多地少，农业生产条件落后，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前，兴国县基本上一直是传统的小农生产，农民只能维持温饱。

① 此处八个农民家庭的人均耕地数是根据毛泽东《兴国调查》中农民家庭自有耕地总数量除以家庭人口数计算出来的，当时兴国农村以“石”作为产量计面积的方法，一般来说，五石谷或六石谷可换算为一亩，当时这八个农民所在的永丰区一带是以六石谷田为主。

1980年,兴国县农村实行家庭土地承包,大多数农民家庭人均耕地不足1亩。随着家庭人口增多以及土地承包稳定性政策的制约,1995年后,八个农民家庭的人均耕地不断减少,到2013年家庭人均耕地多为0.5亩左右。再加上兴国县境内以丘陵、山地为主,没有成片的耕地。这种人多地少、承包地细碎化的人地关系格局形成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化生产方式,制约了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脱贫致富。

2. 农业生产从自给自足向市场化和社会化转变

1930年,永丰区的耕牛极为短缺,为了解决耕牛短缺问题,贫农不得不向富农借养耕牛,“富农把牛婆借给贫农,贫农喂养此牛拿了耕田,每年出利谷一担半(三箩)给富农。生了牛子,贫农富农各占一半”。^{[2](P205)}因此,由于缺少耕牛,只能使用人力为主,采用犁、耙、锄等传统农具进行农业生产,即使是农户耕种少量的耕地,依然要在蒔田、割禾时请零工或换工。大多数农民家庭仅靠自有的少量土地产出的粮食难以糊口,必须要租种地主富农的土地,承受高额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因此,传统落后的小农生产方式无法满足家庭基本生计需要。1949年至改革开放初期,兴国县农民仍然沿袭“人力一畜力一传统农具”的生产方式,而且耕牛依然短缺。1987年“这10户共有耕牛4.08头,有3户无耕牛,2户缺杀虫的喷雾器和脚踏式的打谷机。有些农户农具也不齐全”。^{[3](P504)}1995年除了陈昉琼、黄英明、温常鑫家有一头耕牛外,其余5户也只能2家共用一头耕牛。2008年八个农民家庭开始拥有小型农业机械,如抽水机、喷雾器、打谷机。2013年,农民开始利用政府补贴购买了小型耕田机,耕牛数量下降。

通过比较农民家庭的农业生产投入与产出,发现1987~1994年八个农民家庭的农业生产投入和产出大幅度提高,生产投入平均增长5~6倍,其中农业生产投入支出较多的是购买化肥、农药、畜禽饲料、种子等;农业生产产出平均增长5~8倍,其中粮食产值增长最快。2007年后,随着大量中青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家庭耕种面积减少,但由于主要是老年人从事农业生产,对农业生产资料的市场化和社会化需求更高,化肥、农药和种子的生产性投入仍然很大,尤其是在插秧、收割等农忙季节都需要雇工才能完成,每年的雇工费用不断增多。此时的农业生产虽然仍以家庭为单位的小规模化生产经营,但已不再是自给自足的传统小农生产,而是逐步向市场化、社会化的现代小农生产转变。

3. 产业结构由纯粹小农经济向以非农经济为主转变

1930年,八个农民家庭都是自给自足的生产单位,主要以种植水稻为主,但农业生产力低下,粮食

产量低,缴纳高额的地租和借谷的利息后,无法养家糊口,只有通过男劳力外出做工、妇女养猪和砍柴等来贴补家用、换取生活必需品。1949年后至改革开放前,兴国县农业生产结构没有明显变化,仍然是以传统农业为主的纯粹小农经济,其中种植业在农业总产值中占50%以上,林、牧、副、渔业产值较小。^{[3](P130)}农村改革以来,特别是1986年以后,兴国县农业生产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1978年种植业产值与林、牧、副、渔业产值之比为63.8:36.2,而到1990年为52.5:47.5,^{[3](P131)}林、牧、副、渔业产值增长较快。这一时期,八个农民家庭的粮食产量不断提高,粮食成为家庭收入的主要部分。同时,农民还种植番薯、甘蔗、油茶等经济作物,并养猪、养鸡,增加了家庭副业收入。1990年后,家庭生产结构发生巨大变化,一般是年长的父辈在家种田,农闲时在附近打工,年轻的子女外出到广东、福建打工,打工收入也不断增多。2007年后,种植业和养殖业的产值开始下降,农业兼业化日趋明显,种粮和养殖只是为了满足口粮和改善生活的需要,非农收入成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

五、农民家庭生活方式的变迁

1. 生活水平从难以养家糊口到基本维持温饱向生活宽裕迈进

1930年,八个农民家庭缴纳高额的地租和往年的利谷后,所剩余的粮食根本不够全家的口粮,必须要向地主和富农“生谷”,同时还要借高利贷才能维持基本生计。1949年后,兴国县通过土地改革和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农业发展。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始终处于“低谷”,农民未能解决温饱。1980年,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兴国县农业发展基础薄弱,农民生活水平难以真正提高。1985年,全县仍有三分之二的农民纯收入低于200元,人均纯收入低于120元的特困户有48563户、27.2万人,占全县农业人口的52.7%。^{[3](P104)}1987年,八个农民家庭的人均纯收入除黄英明和温常鑫家超过200元外,其余6户家庭均在200元以下,同时,还缺少口粮并欠债,仍然处于贫困线之下,也远低于同期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406元的标准。

20世纪90年代后,兴国县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开始外出进城务工,非农收入逐渐增多。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产品商品化率不断提高,农民除了种植粮食,还种植甘蔗、油茶等经济作物,并大力发展家庭畜禽饲养业,因此,家庭收入来源多元

化,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调查发现,1994年八个农民家庭的人均收入除雷开文、钟来发家低于1000元外,其余6户都在1000元以上,既不缺粮也不欠债,“他们走出了绝对贫困的沼泽”。^{[1](P1~7)}2012年,八个农民家庭的收入进一步增加,如傅传芳家纯收入38530元,人均收入3853元;温国禄家纯收入19020元,人均收入3804元;李吉错家农业纯收入2900元。^①虽然有6户年轻人的打工收入无法准确统计,但根据2012年末全国外出农民工人均月收入水平为2290元,按照每个家庭年轻夫妻两人外出打工,一年收入约54960元。以每个家庭平均8人计算,2012年家庭纯收入约6万元左右,人均纯收入大概为7500元。而2012年兴国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476元,江西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为7828元。因此,纵观八个农民家庭八十多年来的家庭收入和生活水平变化,可以看出,农民家庭从难以养家糊口到基本维持温饱,逐步向生活宽裕迈进。

2. 消费结构从生存型消费向健康享受型消费转变

20世纪30年代,八个农民家庭生产的粮食缴纳地租和还“生谷”及利息后,根本不够吃,只能靠“番薯丝拌饭”充饥及重新“生谷”,家里养猪只是为了到市场上卖了还利谷和义仓,余下的换取油盐布等生活必需品。平时很少吃肉,只在请人帮工或逢年过节时才买少量的肉。此外,“过去贫农是少有山的……没有山或山太少是贫农一大困苦”。^{[2](P218)}因为没有山就没有烧饭的柴火,就不能砍柴挑到集市上去换油盐,没有木料盖房子做农具,也没有茶油吃。

1980年后,随着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民收入逐步提高,农民家庭生活也逐步改善。1987年,八个农民家庭的自产粮食不够吃,需要买议价粮,同时还欠债,但是猪肉和鸡鸭等肉类食品的消费量开始增多。大部分家庭开始有了自行车、收音机和手表。1994年,随着粮食产量提高,除雷开文家由于人口多自产口粮不足外,其余7户人均口粮都超过500斤,不但可以满足口粮需要,还将多余的粮食用来养猪、鸡鸭等,这样既增加了家庭副业收入,又增加了肉、鱼、蛋等消费量。随着家庭收入不断提高,八个农民家庭开始拆掉原来的土坯房,建造砖木结构的平房,居住条件大为改善。同时,农民家庭的自行车、电扇、黑白电视机、手表等耐用消费品也不断增多。近年来,随着年轻一代外出打工及非农经济收入成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八个农民家庭的粮食生产和家禽饲养主要是供自家食用,并普遍重新翻盖新平房或建二三层楼房,经济条件好的家庭还在墙体外贴瓷砖,

屋内也进行简单装潢,如铺地砖、吊顶、安装抽水马桶等。2008年以来,随着“农网改造”“村村通”“家电下乡”等惠农政策的实施,大部分家庭的耐用消费品进一步更新换代,彩电、冰箱、洗衣机、热水器、手机、固定电话、摩托车等一应俱全。

3. 生命健康保障和社会保障体系从无到有并逐步完善

兴国地处山区,气候潮湿,容易滋生疟疾等流行性疾病。20世纪30年代由于经济落后,农民缺乏卫生常识及缺医少药等更加剧了传染性疾病的流行和蔓延。1930年,八个农民家庭中的老年人普遍患病,儿童死亡率很高。如温奉章的父亲腿疾丧失劳动能力,母亲双目失明。黄大春的母亲病了好几年“做不得事”。陈北平家“去年祖母、母亲、大嫂、2个侄儿都死了”。此外,1930年在兴国农村“贫农70%有老婆,30%没有……游民10%有老婆,90%没有,也比雇农中有老婆的多些,只有雇农才是99%无老婆”。^{[2](P222)}农村中抱“童养媳”成风,如李昌英的女儿12岁就嫁出去了,钟德五的大侄子9岁就讨了一个9岁的童养媳老婆。

1949年后,兴国县医疗卫生条件不断改善。1950~1958年,全县人口出生率上升、死亡率下降,1958年人口自然增长率达23.4%。^{[3](P156)}20世纪70年代,随着农村医疗卫生网络建立以及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全县人口出生率急剧上升。1976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上升到22.26%,年净增人口在万人以上。从1990年起,实行农村集资医疗制度,开始在村一级试办集体卫生所,但由于村级集体经济积累薄弱等问题,农村集资医疗的覆盖率很低,只有3.2%。^{[3](P134~135)}此外,随着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实施,兴国县农村青年的初婚年龄普遍提高,从20世纪40年代男女平均初婚年龄不足20周岁提高到1986年的男性25.32岁和女性23.09岁。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以及医疗卫生保健事业的发展,人口出生率得到有效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逐步下降,从1978年的19.3%下降到1988年的10.48%。^{[3](P147)}

近年来,兴国县农村公共卫生和社会保障事业进一步发展。自2004年实施“新农合”以来,农民参合率不断提高,受益面不断扩大。2012年,全县共有638787人参加合作医疗,参合率为97.65%,较

① 李吉错现在与妻子共同生活,8个儿子已经完全与他经济独立,也很少联系。

② 国家统计局. 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EB/OL]. http://www.gov.cn/gzdt/2013-05/27/content_2411923.htm.

上年增加了 16 641 人,参合率提高了 1.67%。截至 2012 年 9 月 30 日,全县获得新农合补偿款人数为 366 677 人,农民受益面 57.4%。^① 有效地提高了农村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一些诸如感冒、咳嗽等常见病基本上可以在村里及时诊治,生大病就去县城或市里的医院住院治疗,新农合的报销也比较方便。如陈显来的老伴 2010 年做白内障手术花了 1 500 元,新农合报销了 800 元。傅传芳长期患中风、风湿关节炎等慢性病,每次住院要花费五六千元,可以按 85% 的比例报销。此外,随着农村“新农保”政策和失地农民社会保险政策的实施,60 岁以上的农民每月可以领到 55 元的养老金。

六、小农嬗变之困境:农民发展与传统农业型村落转型中的问题与矛盾

通过对《兴国调查》中八个农民家庭变迁的历史回溯,以及对自 1978 年农村改革以来八个农民家庭生活满意度测评,发现农民家庭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呈逐步提高趋势。其中,1978~1988 年,农民家庭生活水平均比农村改革以前有明显提高,但发展速度较缓。主要原因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发展。但由于兴国县农业基础薄弱,生产条件较差,再加上人多地少,仅凭传统单一的种植业很难使农民脱贫致富。自 1988 年后,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非农收入不断增多,农民家庭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逐步从较低水平的自给自足向商品化、社会化的生活方式转变。尤其是 2004 年废止农业税及新农村建设等各项支农惠农政策的实施,农村基础设施、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不断改善,农民家庭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明显提高。然而,通过八个农民家庭八十多年来从传统小农向“社会化小农”嬗变的历程,发现农民的发展及其所在的传统农业型村落转型仍然面临诸多问题与矛盾,从而制约了农民全面发展及村落可持续发展。

1. 农民非农就业与增收困难

1949 年以来,农村文化教育事业迅速发展,农民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然而,通过对八十多年来八个农民家庭成员文化程度的比较发现,从毛泽东“兴国调查”时的第一代到现在的第四代家庭成年人的文化程度并没有明显提高。同时,家庭劳动力多从事传统的农业生产,第一代和第二代个别男性劳动力在农闲时从事木工、篾匠或做爆竹等手工艺劳动。而第三代和第四代虽然是外出务工,但基本上没有接受过专门的技能培训,大多数在工厂或建筑工地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因此,劳动力文化素质与劳

动技能难以提高导致第三代和第四代外出务工就业的不稳定及劳动待遇较低,尤其是在 2008 年沿海发达地区经济遭受金融危机冲击后,许多外出务工的家庭成员不得不返回家乡。近年来,农民的劳动就业及家庭收入与非农产业发展和宏观经济发展密切相关,而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不高以及非农劳动技能的落后很容易导致农民的就业与增收困难。

2. 农民家庭“老无所依、幼无所教”及村落“空心化”问题严重

随着农村大量劳动力长期离农离乡的非农就业,八个农民家庭结构从联合家庭到核心家庭向“户分家合”“分业不分家”的多元化家庭结构转变。年轻的第四代夫妻结婚生子后将年幼的子女留在家中由祖辈照料,而且大多数 50 岁左右的身体健康的爷爷或奶奶依然在县城附近打工贴补家用,此时一些 70 岁以上的曾祖辈便承担起照料曾孙辈的任务。因此,虽然大多数农民家庭因务工收入增加而提高了生活水平,但老年人的生活照料、生病护理以及年幼孩子的亲情关爱却严重缺失,从而导致家庭“老无所依、幼无所教”问题。而许多农村也因为大量年轻人外出打工,村里只剩下留守的老人和儿童,村落的“空心化”日趋明显。此外,近年来不断撤并行政村及村级小学,造成了农村学龄儿童上学困难以及新的农民负担,更加剧了村落的“文化空心化”。

3. 农村环境问题与可持续性发展的矛盾

随着家庭收入水平提高,尤其是年轻一代进城务工以后消费观念的日益现代化,农民家庭的生活方式也逐渐“城镇化”。调查发现,自 1990 年以来,八户农民家庭建房热情持续高涨,基本上是每隔 5 年左右就要翻建新房,从砖木结构平房逐步变为砖混结构的二三层楼房,住房面积不断扩大,房屋的内外装修档次也不断提高。由于建房所需资金不断增多,基本上是外出打工的钱除去生活开支外都投到建房上了,而且还要欠数十万的债务。而新房建好后,除少数由老年人住在新房子外,更多的则是新房变空房。更令人担忧的是,由于村里人多地少,宅基地非常紧张,因此,农民只能在自家的承包地里建房,浪费了大量的耕地。为了追求城镇化的生活方式,农民在建新房时都安装了抽水马桶,粪便污水通过管道直接排放到小河、小溪或低洼处,造成了农村水源污染。同时,随着农村商品化和市场化程度不

^① 兴国县卫生局. 兴国县 2012 年公共卫生服务基本情况[EB/OL]. http://www.xingguo.gov.cn/zwgk/shgl/201210/t20121030_117700.htm.

断提高,塑料袋等白色垃圾污染也日益严重。可以说,农民家庭生活方式的“城镇化”产生的农村资源环境问题影响了农村可持续性发展。

4. 传统农业型村落的转型问题

通过对八个农民家庭及其所在村落的调查发现,目前仍然是以传统种植业为主的小农生产经营方式,农村产业结构难以有效调整,大量农村劳动力长期进城务工,农民收入非农化以及农业兼业化现象日益明显。为了发展经济,一些村庄也曾效仿“明星村”发展乡村工业的模式,但由于缺少资金、技术以及管理等原因都未能取得成功。因此,如何立足于村落的资源潜力,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and 主动性,合理调整产业结构,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是这些传统农业型村落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棘手问题。现代农业的发展是以有文化、懂技术、会管理的新型职业化农民为生产主体的,以有组织的规模化生产为生产方式,以现代农业科技的应用推广为支撑,以完善的农业基础设施为基本保障的现代化农业。然而,大多数传统农业型村落所拥有的人力资源、组织资源及基础设施等难以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调查发现,八个农民家庭所在村落中,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使村落发展失去了最紧缺的劳动力资源,导致村落精英和基层组织骨干的流失;同时,地方财政及村级集体经济发展非常薄弱,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和社会化服务滞后,农村产业结构的难以有效调整,导致这些村落转型与发展路径不明,动力不足。

如何有效解决小农嬗变中的农民发展与村落转型中存在的诸多困境成为继续推动农村改革的关键。其实,大多数传统农业型村落并非毫无发展潜力和前景,而且也具有许多后发优势,如拥有发展现代特色农业的独特资源,村民发家致富的强烈欲望和需求,具有创新精神的村落精英,以及近年来各级政府出台的各项支农惠农政策等。因此,传统农业型村落发展的关键是需要内源发展与外部干预有机互动与整合,要充分挖掘和利用村落发展的优势资

源和潜力,培养以村落精英为主体的新型职业农民并充分发挥其示范和带动作用,培育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开展适当规模化经营;同时,建立健全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为发展现代农业和现代化小农生产提供完善的社会化服务。此外,地方政府要加大对农民外出务工的技能培训、就业服务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社会服务与社会管理,为农民发展和村落转型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条件,从而真正地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以及新型“四化”同步发展。□

[参 考 文 献]

- [1]徐勇,邓大才. 社会化小农:解释当今农户的一种视角[J]. 学术月刊,2006,(7).
-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 [3]中国国情丛书编辑部. 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兴国卷)[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
- [4]傅伯言,罗莹. 他们走出了绝对贫困的沼泽——对毛泽东《兴国调查》中有关人员后裔情况的再调查[J]. 江西社会科学,1999,(1).
- [5]胡玉春. “兴国调查”中八个农民的命运[J]. 史海泛舟,2006,(4).
- [6]赖福荣. 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兴国调查”——从八个农民家庭今昔看中国农村变化[J]. 百年潮,2008,(11).
- [7]毛泽东.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A]. 毛泽东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收稿日期 2013-10-01

[责任编辑 韦丹芳]

[责任校对 苏兰清]

[作者简介] 鲁可荣(1970~),浙江师范大学农村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农村发展与管理。金菁(1991~),女,浙江师范大学农村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浙江金华,邮编:321004。